

人类学名著译丛

科学的 文化理论

B·马林诺斯基/著

黄建波等/译

张海洋/校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科学的文化理论

B·马林诺斯基/著

黄剑波等/译

张海洋/校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明清

平面设计：赵秀琴

责任印制：丁燕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科学的文化理论 / (英) 马林诺斯基著；黄剑波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10

ISBN 7-81056-283-5

I. 科… II. ①马…②黄… III. 马林诺斯基 (1884-1942) 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8196 号

科学的文化理论

根据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翻译

Copyright, 1994, by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27 号 邮编：100081

国际互联网网址：http://cunlp.com.cn

电子邮件 (E-mail): nckpm@public.na.net.cn

电话：68932218 (总编室) 68472815 68932751 (发行部)

传真：68932447 68472815

印刷者：北京市朝阳区科普印刷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125 字数：120 千字

版次：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1056-283-5/C·42

印数：0001-5000 册

定价：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人类学名著译丛编委会

主 编：陈 理 丁文楼

副主编：张海洋 潘蛟 张山

丛 书 总 序

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把应该翻译而没翻译的人类学名著，一本一本地翻译出来，推向社会，以弥补人类学传统在中国的断层和缺环，并为中国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提供借鉴。

促使我们做这件事的原因也很明确：人类学是跨文化地探讨人生、文化和社会，促进人类理解、交流和合作的学科。在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强，经济文化接触频繁，碰撞和误解不断发生，人欲膨胀且环境告急的今天，在中国普及和更新人类学知识，提高它的教学和研究质量，已经刻不容缓。而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无论是普及还是提高，中国人类学都需要一批可靠的译著来作借鉴。

中国的人类学是从西方舶来。它是 1840 年以后，中国面对“亘古未有之变局”，对外关系经历过从“夷务”到“洋务”，又从“洋务”到“外务”的转变后，幡然追求现代化的结果。此前的中国曾自以为是“天下之中”：它的语文就是世界语，它的经典就是天经地义，它的文人就是世界师表，它的道德文章放之四海而皆准。即使 1860 年之后洋务运动，也没有使中国人感到需要从外国进口道德和文章。

1894 年甲午战败，变法维新才被提上中国的日程。作为“新学”和“变革者的科学”，人类学于 1903 年在中国登堂入室，辟为京师大学堂课程；1920 年代建立研究机构；1930 年代研究乡土中国；1940 年代讨论边疆政治并倡导学科本土化；1950 年

进行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1960年代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后被强断；1970年代末恢复教学；1980年代强调为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服务；1990年代强调学科规范并重提学科本土化。萦绕在这些事件之后，还有崇尚科学与民主的五四精神，有中国社会性质讨论、中外文化比较、中国民族概念定义、中国的民族和社会形态、中国各民族的现代化、人类学的中国化等命题。

学科性质使人类学在中国始终与国家政治、国民经济和国人世界观念的构建密切纠结。这种经世致用的导向推动了它在中国的发展，但也给它留下深深烙印和累累断层：中国1911年代的国内革命战争、50年代的思想改造和反右、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等。1978年以后的中国进入百年不遇的承平时期，但80中期的思想交锋和90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仍对人类学的发展有直接影响。

因此，尽管人类学在中国有蔡元培等先贤的全力推动，尽管中国人类学引进过包括苏维埃学派在内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也推出过像费孝通《江村经济》（1938年）和林耀华《金翼》（1941）那样的学术精品，但它的学科基础一直薄弱。例如，英国功能学派被中国引进、推崇和批判迄今凡70年，但学人们至今读不到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1922）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民》（1922）的中文译本。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已经20年，我们却直到90年代才认清国外人类学1960年代以来发生的巨变：

种族不再是生物学事实，而是社会文化构建；传统不再是先民的旧俗古礼，而是后人的改制发明；文化不再是人类适应环境的生活方式，而是人们编织的意义之网或权势话语；民族不再是远古生成的文化实体，而是由现代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乃至

“印刷技术”构建出的“想象的共同体”；部落或部族不再是社会或民族的进化阶段，而是早期人类学家就“生与熟”，“野与文”，“他与我”而做的截然两分。甚至苏丹的“努尔人”和印度的“种姓”也都不是原生事实，而是西方殖民当局造成的行政遗产。更严厉反思和批判还包括：人类学不是在探求真理，也不是在解读“退色的外文残稿”，而是在通过“想象的异邦”来确认自身……

面对“人类学事实”的这些变幻，我们困惑，以至于不敢贸然说个“是”或者说个“不”。我们犹疑于说“是”或说“不”，不是因为我们困惑于“是要弄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个糊涂”，而是因为我们有许多“该念的书都还没有念”。我们没有念这些书，是因为啃读原文太难和太慢。我们渴望读到中文译本，但目前被译成中文的人类学名著十不及一，一颇多桀错。甚至到1998年，甚至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人类学专辑，15-3），也还是把民族学（ethnology）和民族志（ethnography）译成“人种学”和“人种志”。

苦于这些困惑和困难，我们感到进行学科知识补课之必要。补课的内容之一，就是把人们经常引用的人类学名著，不论新旧，都原原本本地翻译出来，编印成套，以便让有志者把学科基本问题弄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我们认为人类学在今天的危机和困惑，是它自我反思和自新图强的体现。我们仍然相信人类学有助于人类理解、交流与合作的学科。从古典进化论、新进化论到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批判的转向，反映出人类学在进展的深度。我们要弄清它的发展轨迹及其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含义，所以倍感翻译和出版这套丛书之迫切。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成为国人理解变化着世界的参照，也成为

中外学人对话交流的基础。我们自忖学问浅薄，见识有限，也唯恐这套丛书重蹈“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之覆辙。因此，我们恳请海内外同仁同好对我们的工作勤加鞭策并援并相助，从各个角度帮助我们推荐书目，联络版权，寻找资料或承担译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非曰能之，唯愿学焉。谨以此志与同仁同好共勉！

人类学名著译丛编委会

1998年3月8日

目 录

马林诺斯基与中国人类学	(1)
英文序言	(25)
科学的文化理论	(28)
1. 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文化	(28)
2. 人文学者的最低科学定义	(31)
3. 人类学的概念与方法	(36)
4. 什么是文化	(52)
5. 组织化行为的理论	(57)
6. 组织化行为的基本单元	(63)
7. 文化的功能分析	(74)
8. 什么是人性	(79)
9. 文化需求的衍生	(86)
10. 基本需求与文化回应	(90)
11. 衍生需求的性质	(111)
12. 人类文化的整合驱力	(119)
13. 功用性实施的关键序列	(122)
功能理论	(129)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传记评价	(150)
译后记	(182)

马林诺斯基与中国人类学

——《科学的文化理论》译序

功能学派（或称结构功能学派）和功能理论（或称结构功能理论）诞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它的奠基人是马林诺斯基（以下简称马氏）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以下简称布氏）。目前，功能学派及其理论对社会学和人类学仍有影响，且是人类学的主流范式。关于此点，吴文藻和王庆仁 1981 年曾撰文介绍^①。近年的综述则见于黄淑娈、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1996），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1997），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997）。作为马氏《科学的文化理论》的译序，本文拟在前人的基础上申说四点：Ⅰ．功能学派与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Ⅱ．马林诺斯基与功能学派及其理论；Ⅲ．《科学的文化理论》与《文化论》；Ⅳ．功能理论与中国的人类学。前三点旨在为读者阅读马氏的这部理论著作提供些许参考。第四点是笔者关于中国人类学建设的一点浅见。

Ⅰ．功能学派与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

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曾达到过一个高度。它反映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社会学界》第 10 卷（1938，P425—430）的“1936 至 1938 年度概况”中。这个高度与英国功能学派

^① 吴文藻、王庆仁：“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今昔”，原载《民族研究》1981 年第 1 期，后收入《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第 294—308 页。

及其两位奠基人都有关系：1930年，林振鏞翻译马氏的《蛮族社会之犯罪与习俗》（1926，上海华通书局）。1935年，燕大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在《北平晨报》副刊《社会研究》第111、112期发表“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表示要综合英国功能派理论和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以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

1935年秋，布氏应吴文藻之聘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与吴先生“终日相处，先后凡两阅月，谈论辩难之间，大恨相见之晚”^①。当时为布氏做讲学助手的，就是后来名满学界的林耀华教授。为了纪念布氏的这次讲学，燕大社会学系还将1936年的《社会学界》第9卷辟为“布朗教授纪念专号”，发表了布氏“社会科学中之功能观念”、“人类学研究之现状”和“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吴文藻“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林耀华“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等重要文章。布氏的其他情况请见潘蛟的《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译序（本丛书之一）。

马氏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关系更深。1936年底，他接纳吴先生的学生费孝通为博士生。吴先生当年访英时，马氏“得闻中国社会学界中已自动采用与彼相似之观点，以研究中国文化，兴奋之情，不能自己。当即集其门下诸生，组织座谈会，以吴师为主体，讨论研究中国文化之方法问题。”就这样，马氏与吴氏“多月相聚”，引为莫逆。分手时，遂“出《文化论》初稿相赠，举杯作不忘约”，并嘱费孝通承担翻译之责^②。1939年，

^① 吴文藻：“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原载1936年燕京大学出版社《社会学界》第九卷。并见《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第159—189页。

^② 参见费孝通《文化论》译序，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第1—3页。

马氏安排了费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江村经济》出版英文版(Routledge),并写下一篇长序。序言表达了他对费博士的欣赏、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挚爱,以及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①。至于费博士对马老师的爱戴,他自伦敦经济学院毕业60多年来对于“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孜孜以求,以及中国民族学及人类学对英国社会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介绍和实践,都已是中国学术界的佳话^②。能够印证马氏及其功能理论对中国人类学的影响的,还有美国学者顾定国(Gregory E. Guldin)近年写的《中国人类学逸史》(1994,本丛书之一)。

中国是文化和学术大国。吴、费、林都是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界的一时之选。由他们向国人介绍功能学派及其奠基人的理论和作品,其势自如高屋建瓴,但理有固然者事不必至。1930年至今已近70年。70年来,长寿的拉德克利夫—布朗(1881—1955)屈指可数的专著中,仅有一部《社会人类学方法》在1988年被译成中文(夏建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短命的马林诺斯基(1884—1942)著作较多,被译成中文者亦不算少,但他的成名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1922)和代表他“最成熟见解(most mature views)”的《科学的文化理论》(1942),迄今尚无中文译本。这是我们的现状,它从一个角度映衬出中国人类学的成熟程度。个中原因后文讨论。

II. 马林诺斯基与功能学派

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早年身世扑朔迷离。

^① 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马序》,戴可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② 参见费孝通著、张智楚编的《走出江村》中的有关文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

功能学派晚辈门人库珀 (Adam Kuper) 疑其自我造神, 因而立志脱魅^①。但脱魅后的马氏仍然魅力十足: 他 1884 年 4 月 7 日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兰克拉科夫, 自幼在知识分子气氛中熏陶。1902 年 18 岁进入乃父执教的杰格隆尼 (Jagellonian) 大学读物理学和数学, 而兴趣则在哲学。1908 年, 他以全奥最优成绩获得物理学和数学博士, 论文题目是“论思想的经济原理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Economy of Thought)”。马氏此时对弗雷泽的名著《金枝》着迷, 但还没有投身人类学。

取得博士学位后, 他到德国游学。一说在莱比锡的奥斯特瓦尔德理化实验室从事研究; 一说在莱比锡大学师从布依赫 (Bucher) 学经济史, 主要还是向冯特 (Wehlein Max Wundt, 1832 - 1920) 学习实验心理学。这位冯特曾以民众心理学、集体意识和文化整体论等思想影响过法国的杜尔干 (E·Durkheim, 1858 - 1917, 又译迪尔凯姆) 和美国的博厄斯 (Franz Boas, 1858 - 1942)。两年的游学经历对马氏影响很大: 他开始研究澳大利亚土著家族组织, 后来的著作也都带有心理学和经济学色彩。

1910 年, 他进入伦敦经济学院, 加入社会学和人类学行列。当时做他老师的有英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 (1907) 霍布豪斯 (L·T·Hobhouse, 1864 - 1929)、研究人类婚姻史并挑战原始杂婚说的芬兰籍社会学教授韦斯特马克 (E·A·Westermarck, 1862 - 1939), 还有研究大洋洲和非洲的人类学教授塞利格曼 (C·G·Seligman, 1873 - 1940)。这种背景使马氏在 1924 年晋升教授 (reader) 之职时, 力主将自己从事的学科称为“社会人类学”而不称“文化人

^① Adam Kuper: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 - the Modern British School*,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3. P10.

类学”^①。1913年，他发表《澳大利亚的土著家族》（英文）和《原始宗教与社会结构形态》（波兰文）。前者因其科学方法而大受布氏赞誉，后者则表明马氏对杜尔干的宗教理论也曾一往情深^②。此后数年，他中断写作进行田野工作。

马氏初到英国时，正值学术界大兴实地调查之风，各方面都在呼唤实证知识和经验研究，呼唤实地调查和抢救落后（survey and salvage），呼唤对殖民地统治的新方式^③。1914年，马雷特教授（R·R·Marett, 1866-1945）衔命考察澳大利亚，需要一名助手。他的波兰裔女学生 M·A·Czaplicka 乘机推荐时年 30 岁，研究过澳大利亚土著家族的同胞马氏。马雷特对此深感得意，发愿要让这位女生因此成为波兰名人^④。

马氏自命不凡，一直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自我期许。这次考察使他得申其志。考察当中一战爆发，马氏的身份使他陷入窘境：作为敌国（奥匈帝国）臣民，他必须被羁留在英国属地；作为科学家，他可以选择返回欧洲；作为英国的大学学者，他有权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任意考察，甚至得到资助；作为人类学家的助手，他有马雷特和塞里格曼的指导和项目经费支持。这与中国古代文人被贬谪投荒相比，实在是心境相似而处境略佳。立志研究人类学的马氏借题发挥，在逆来顺受的“自由羁压”中大大延长了考察时间。

1914—1918年，他到新几内亚考察三次：第一次 1914，9—1915，3。这次考察借助翻译，对象是土伦（Toulon）岛的梅鲁

① Kuper: P19. 马氏当时的意图一是与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划界，二是与英法的社会学结盟。

② 影响马氏的杜尔干理论，主要见于杜氏《宗教生活的原始形式》（1915，本丛书之一）。

③ 参见吴文藻：《功能派社会学的由来与现状》（1935）。

④ Kuper: P12.

(Mailu) 人。后来的考察报告, 加上 1913 年的《澳大利亚土著家族》, 使他在 1916 年被授予伦敦经济学院科学博士学位。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时间一说为 1915, 5—1916, 3 和 1917, 12—1918, 9; 另一说为 1915, 6—1916, 5 和 1917, 8—1918, 8^①。两次的地点都是特罗布里恩岛 (Trobriands), 使用的都是当地土著语言。这是专业人类学家首次用土著语言进行田野工作。马氏调查之深入和描述之细致, 曾使在当地生活 30 年的包德文神父 (Father Baldwin) 深为折服并自叹不如^②。这段经历和成果, 构成他 1922—1935 年发表 7 部专著的基础, 他 1920—1938 年在伦敦讲学的核心, 也是他确立现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规范的依据。

1918 年一战结束, 考察完成, 但马氏没有返回伦敦: 先与澳大利亚一位教授之女结婚, 后来在澳养病。1920 和 1921 年两个夏天, 他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讲学。1923 年, 他成为伦敦大学教师。同年, 母国的克拉科夫大学请他出掌民族学系不果。1924 年 40 岁时, 他出任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当年就有弗斯 (Raymond Firth) 和埃文思—普里查德 (Evans - Pritchard) 到门下就读。他后来的学生还有大名鼎鼎的利奇 (E·Leach, 1910—1989)、帕森斯 (T·Parsons, 1902—1979) 和费孝通 (1910—) 等。1927 年, 他出掌伦敦大学新建的人类学系, 他的恩师塞里格曼则是该校的民族学系主任。可见布氏在《社会人类学方法》中竭力申说民族学和人类学是两个学科也不无根据。

马氏激情洋溢但身体孱弱, 对战争深恶痛绝。但战争对他却情有独钟, 挥之不去。1938 年, 他离英赴美度休假年, 再次遭

① 前说系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人类学系路达雅 Rod Aya 教授提供, 后说见于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第 110 页和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第 128 页。

② Kuper, P18.

逢世界大战。好在他这次是名人访问盟邦，所以 1939 年战端一开，他就选择在耶鲁大学任教以避兵锋。后来还担任过波士顿博物馆教授（1940）。避战期间，他开始研究美洲大陆文化，调查墨西哥的农民集市，并与墨西哥学者费扬特（Julio de la Fuente）联名发表过一部西班牙文的著作。该书对墨西哥的人类学和公共政策有过重大影响，但直到 1982 年才发表英文译本。

1941 年 5 月，古典进化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剑桥大学弗雷泽教授（1954—1941）逝世。马氏为之心碎并写下纪念长文（见本书附二）。文章在评述弗雷泽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之余，也叹息一战以来世风日下，君子难为，并诅咒二战会把全欧洲的君子殊残净尽。马氏当年 57 岁，风头正劲又远离欧洲，自然不想死神也会垂顾于他。转年 5 月 16 日，他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于纽黑文。身后留下三个女儿，一腔未酬之志，还有《科学的文化理论》一部书稿。

马氏在世仅 58 年，但留下的著述足以骄人。光是专著就有《文化论》（1936），《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1922），《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1927），《原始社会的性与压抑》（1927），《野蛮人的性生活》（1929），《珊瑚园艺及其巫术》（1935），《自由与文明》（1944），《科学的文化理论》（1944），《文化变迁的动力》（1945），《巫术、科学与宗教》（1948），《性、文化和神话》（1962）等等。此外，他还留下四笔学术遗产：他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包括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和强调对研究调查对象的所言、所行与所思之差别的辨析；他的研讨班教学法；他与布朗氏同创的功能学派；他的文化功能论。本文简单介绍后两者。

第一，功能学派及其特点。1922 年，马、布两氏分别发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安达曼岛民》两部民族志专著，是为功能学派的奠基标志。这一学派的特质概有：以结构功能观点研

究社会文化、开放式的研讨班教学，对田野工作和叙述手段的强调，质量优异的民族志专著，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强烈认同（包括长幼有序亲如家人的气氛），等等。这些特点使它在二十至五十年代与美国人类学历史特殊论学派分庭抗礼，并主导了欧洲人类学界。在如日中天的四十和五十年代，功能派掌门人布氏甚至不屑以学派自称，而以科学自诩，亦即人类学中的惟一科学和不二法门^①。当时，功能学派就是社会人类学的代名词。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列维—斯特劳斯从美洲返回巴黎并掀起结构主义的浪潮，延续到六十年代社会革命席卷欧美，延续到七十年代马、布两氏的及门弟子从学术一线引退，从而再次印证了库恩（Thomas Kuhn）关于学术范式更新条件的假说^②。七十年代以后的功能学派逐渐融入更加宽泛但无以名之的当代人类学主流^③。但它的范式和业绩仍在现代人类学中沦肌浹髓。即使在后现代的今日，我们要做人类学，也还是要读一些功能学派的书，走一段功能学派的路（详见下述）。

第二，功能学派的内部差别。功能学派红火 30 多年，内部也有变迁。简单讲，它脱胎于泰勒、摩尔根、弗雷泽的进化论，结合了杜尔干的社会本体论和冯特民俗心理学，归宿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论。内在地看，它又分为 1924—1938 年和 1939—1955 年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工作范式是典型的马氏经验功能论。它以马氏为主帅，重心在伦敦经济学院，成员多犹太人、外籍人和妇女，田野工作多在太平洋诸岛，研究主题是生活史（包

① Radcliffe - Brow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London, 1952, P188 - 189.

② T.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1970.

③ 费孝通教授 1986 年撰文认为功能学派五十年代开始萎缩但未解体。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费撰“功能学派”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